

“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与政治传播

权宗田

(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0)

摘要: 先进知识分子是“五四”时期政治传播的主体。这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政治传播作为自己的自觉使命, 是政治思想推介、启蒙者, 政治思潮的引领者和政治理想的实践者。“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政治传播的时代特点体现在: 政治思想引进与选择的结合; 政治传播与政治实践的结合; 社会道义担当与政治价值选择的结合。

关键词: 五四时期; 先进知识分子; 政治传播; 时代特点

中图分类号: K2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1-0058-05

伟大的“五四”运动是一场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率先发起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和反帝爱国运动的集合, 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前先进知识分子的政治传播促成了“五四”运动的发生, “五四”运动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政治传播既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内容, 也使“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有着坚实的政治理论支撑和一定的社会群众基础。对“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与政治传播的关系进行梳理, 既是还原历史的真实的需要, 也是政治传媒化时代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需要。

一、先进知识分子: “五四”时期政治传播的主体

政治和传播的关系非常密切, 政治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传播活动, 没有传播就没有政治和政治生活, “政治是传播的主神经, 传播是政治的控制器”^{[1](18)}。“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而且深入发展, 先进知识分子的政治传播与政治实践功不可没。

从教育救国到实业救国, 到维新改良救国, 再到革命救国, 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之路。这些爱国知识分子不仅是救亡图存的实践者, 也成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先行者。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 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这一点。”^{[2](559)}

在传媒尚不发达的“五四”时期, 虽然报刊杂志已经有许多, 而且也有了一些大众化的报刊杂志, 但总体而言, 传媒的大众化还无从谈起, 政治传播还不可能成为一般社会民众都能够进入的活动领域。这时, 知识分子不仅承担着创造知识的责任, 而且还必须承担传播知识的责任, 因此, 先进知识分子就自然在此过程中成为了政治信息传播的主体, 对政治思想的传播、政治运动的开展、政治发展的深入起着传承和组织作用。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理想境界, 人格塑造、人文关怀和对理想政治的追求是中国知识分子具有的优秀品质。“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在继承这些优秀品质的基础上, 将这种追求与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富强结合了起来。政治传播既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主要手段, 也对唤起民众的觉醒、推动整个民族和人民起来为争取独立和富强而斗争起到了思想启蒙和政治引导作用。

“五四”运动之后, 更多的先进知识分子参加到了政治传播的队伍中来, 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实现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转变, “1919年学生运动发生后, 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更大了。几乎所有与新文化运动有联系杂志都刊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3](15)}。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建立在共产主义思想广泛传播以及这种传播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 先进知识分子构成了早期共产党队伍的主体。

收稿日期: 2007-06-10; 修回日期: 2007-09-19

作者简介: 权宗田(1978-), 男, 湖北郧西人, 武汉理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法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执政党建设。

二、政治传播：“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的自觉使命

（一）政治思想推介

政治思想是政治变革的先导，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所进行的政治启蒙、变法维新、暴力革命，都是在学习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爱国知识分子所进行的译介资产阶级思想著作、创办政治报刊、广泛传播外来的新思想、宣传政治变革等政治传播活动，在探索近代中国救亡、立国、发展道路上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政治思想推介是政治传播的基础性工程，也是政治传播的重要内容。政治思想推介以及政治传播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能够弥补革命力量的不足，这在广大社会民众尚未完全觉悟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正如有论者在评价政治传播载体之一报纸作用时所指出，“尤其在政局动荡之时，报纸能迅速地鼓动广大民众，将民众导向一定的目标”^{[4](241)}。

“五四”运动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政治思想推介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并直接推动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虽然这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仍然很有市场，但这时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得到日益广泛的宣传，并为其最终战胜各种错误思潮而成为近代中国先进思想的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

（二）政治思想启蒙

知识分子由于其对知识的掌握，使得他们最有可能最先觉悟并承担思想启蒙的重任。列宁曾深刻指出，先进的思想理论不可能在工人阶级中自发产生，“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5](319)}

在先进知识分子看来，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有名无实，政治比以往更加黑暗，因此要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传播民主政治的价值观念更为重要。“五四”时期的政治传播成为先进知识分子传播进步理念、启发社会民众、营造社会变革所需要的社会舆论的重要武器。早期的激进主义者、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的陈独秀之所以创办《新青年》杂志，其动机正在于要对全国人民进行政治思想启蒙：“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全改观。”^{[6](65)}

先进知识分子所进行的这种政治传播和思想启蒙不仅引起传统政治力量的关注，也使得政治新闻、政治思想以及政治观点日益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关注的重点，借助“书籍和报纸具有一种天然的动力，这就是形成以集中化模式为基础的、全民族统一的观点”，^{[7](316)}越来越多的爱国青年和社会民众卷入到救亡图存的政治活动中来。

“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启蒙与学生、工人运动的相互呼应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的卑劣行径一经先进的报人兼知识分子邵飘萍传入中国，就引起了国人的愤怒，不仅青年学生，一般社会民众也直接卷入了这场运动。

（三）政治思潮的引领

思想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面对民族危亡，积极投入到中国社会思想的重构洪流中，并将这种思想重构与爱国实践相结合，成为先进政治思潮的引领者。

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面向全社会传播新闻，设定政治议题，对社会舆论进行诱导。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政治传播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思想的推介，而且也是为寻找国家出路所做的探索的一部分，这种政治传播一开始就具有意识形态的某些特点。

“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有效利用报刊杂志进行政治传播的过程中，与意识形态公开联系了起来，使政治传播的意识形态功能更加凸现，并使之上升为一种社会动员的有效力量，这时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日渐鲜明地表现为运用新的政治思想来引领中国前进。

“五四”运动后期，李大钊进一步指出：“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8](308)}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先进知识分子通过与形形色色的社会政治思潮的论战在“五四”后期确立了社会主义思潮的主导地位，李大钊等早期共产主义者也实现了由政治传播者向政治实践领导者的转变。

（四）政治理想的实践者

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预演，各种各样的政治理想在这场运动中相继登台亮相。到了“五四”时期，先进政治思想则逐渐力压其他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在成功领导“五四”运动的同时将这场运动视作实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理想

的最初平台,并在此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政治理想、政治传播与群众运动的初步统一。

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李大钊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的解决,必须靠著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那么我们要想解决一个问题,应该设法,使他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为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9](104-105)}

这就是说,社会运动对于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而社会运动需要先进理念的指导。因而,“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始终关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政治进步,并在政治传播的同时积极实践政治理想,自觉充当了政治思想启蒙和政治理想的实践者的双重角色,积极投入到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理想的建构中。但这种实践主要还是知识分子式的,而不是革命者式的,他们主要想通过政治思想形成、政治思想研究来影响社会政治舆论。

(五) 积极的政治参与

先进知识分子在进行政治传播的同时也是政治活动的领导者,陈独秀就被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五四”运动当天,陈独秀即撰写文章指出“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10](2)},声援和支持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在“五四”运动爆发的第二天,陈独秀本人直接走上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号召国民直接行动以图“根本改造”。他在1919年6月更因散发爱国传单而被捕,度过了3个月的铁窗生活。

“五四”运动是一场现实的爱国运动,与学生运动密切相关的还有知识分子倡导、在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的抵制日货运动等反帝爱国运动。如穆藕初指出:“抵制日货虽属消极,然釜底抽薪,大可摧折强权,愈持久而效力愈显。”^{[11](114)}穆藕初等知识分子还在实际中为抵制日货、发展民族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很多民族企业都是由持有“实业救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展起来的,穆藕初本人则于1920年结集华商纱厂巨子聂云台、荣宗敬等组织了华商纱布交易所,抵制日本商业侵略。

“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为争取独立解放而进行的斗争,不仅是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的重要转折点,

也为新型知识分子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契机。这时的新型知识分子已经开始由单纯的政治思想传播转向政治思想传播与政治参与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是这时崭露头角的。

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知识分子政治传播与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创立起来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全国53名党员中,只有2人是工人,其余51人皆是知识分子。这时作为政治传播主体的先进知识分子日渐成为政治革命的主体,完成着身份的转变。

正是知识分子这种积极参与的政治态度,以及对民族、国家、人民所抱有的责任感,不仅使得先进知识分子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主体力量,而且党在成立时也将知识分子作为和产业工人(即无产阶级)“无异”的力量来看待的,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即确认“党内、党外的先进知识分子并无异于产业工人”,因而“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受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12](47)}。

三、“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政治传播的时代特点

(一) 政治思想引进与选择的结合

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所进行的西方政治思想引介、宣传甚至讴歌,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起了开路作用,同时也成为开化民智、扩大民视的主要力量和渠道。这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走出传统的藩篱,不仅关怀中国当下的处境,而且能够从世界范围找寻社会制度发展的趋势,为中国设计未来,资产阶级政治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所反映的正是为寻求出路所进行的探索。

到了“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中具有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那部分人逐渐分离了出来,在反思政治传播效果的同时,逐步确立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决心。这种分离和抉择,既说明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出现了巨大分化,这种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的政治走向和政治发展,也说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进行政治传播、政治运动的过程中所选择适合中国道路的历程是艰难复杂的。

1920年4月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于新

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13](516)}这既说明了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对中西文化的正确态度，也揭示了“以俄为师”的转向、社会主义思潮确立主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深刻原因。

在政治实践中，“一大”前后陈独秀也多次明确反对照搬外国模式。可惜的是，陈独秀在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却受到俄国革命经验的消极影响而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个理论问题，经过中国革命实践的多年摸索，最终由毛泽东给予了科学的回答。

（二）政治传播与政治实践的结合

有论者曾精辟指出，就“五四”时期的社会环境而言，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是“一身二任”：一方面，作为思想界的盗火者，他们担负着启蒙民众、传播理性的精英使命。另一方面，作为社会革命的一分子，他们又肩负融入大众革命洪流，助革命以成功的责任^[14]。

经世致用是中国传统伦理——政治型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内核，“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进行政治传播时秉承的正是这样一种理念，将政治诉求与政治传播活动有机地结合了起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中指出：“本志《新青年》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15]

巴黎和会的召开，使广大知识分子对国内政治发展的期待更大，改造愿望也更强烈。1919年1月，陈独秀发表《除三害》一文，强调“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甚至在必要时“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而出，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16]在“五四”发生后陈独秀进而喊出了“平民征服政府”的口号^[17]。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先进知识分子在完成近代化角色转变的同时，成为抨击旧的封建专制制度和军阀势力的主导力量，“五四”后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更是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传播的同时，开始将政治传播与发动民众改造旧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结合起来，创建了新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三）社会道义担当与政治价值选择的相结合

“以天下为己任”是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精神追求，从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到“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李大钊，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

自觉地担当起了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任务，这使他们在进行政治传播的同时进行着艰难的政治价值的选择。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进行政治传播并不单纯是引进西方的政治文化，也不只是单纯的进行政治传播，而是将政治传播与政治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知识分子要将社会道义担当与政治价值的选择结合起来。如五四运动的重要领导人陈独秀，在1901至1915年间曾做出过多种职业选择和政治探索，如留学日本、组织学社、发起爱国会、参与暗杀团，但他发现这些都不能解决民族危机和国家富强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他认识到社会思想启蒙是非常重要的，因而他创办了以宣传新思想为主要任务的综合性杂志，他说：“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18]明确地把这种职业选择定位在唤醒民众以“适用生存于今世”的价值取向上。

“五四”以前的先进知识分子大都是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曾满怀激情地参加了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也曾信奉过民治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但都遭遇失败，宣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而恰在这时，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本身的优越性加上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府对华采取了不同于帝国主义的友好态度，“五四”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对苏俄的经验进行了大幅宣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也给中国人民提供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外的第三种选择——社会主义。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更是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早一批党员，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参考文献：

- [1] 邵培仁. 政治传播学[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
-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一大”前后(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4] 徐雪筠. 上海近代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 [5] 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唐宝林. 陈独秀年谱[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7]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北京：商务印

- 书馆, 2003.
- [8] 李大钊选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8.
- [9] 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 上册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1.
- [10] 任建树. 陈独秀著作选: 第 2 卷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 [11] 赵靖. 穆藕初文集[C]//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12] 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1921~2002)[Z].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06.
- [13] 陈独秀文章选编: 上 [M]. 上海: 三联书店, 1984.
- [14] 刘忠.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和形象抒写[J]. 云南社会科学, 2005, (1): 114-119.
- [15] 陈独秀. 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J]. 新青年, 5, (1): 1918-07-15.
- [16] 陈独秀. 除三害[J]. 每周评论, 1919, (5): 1919-01-19.
- [17] 陈独秀. 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J]. 每周评论, 1919, (23): 1919-05-25.
- [18] 陈独秀. 敬告青年[J]. 新青年(卷 1, 1 号), 1915-09-15.

The advanced intellectuals in the period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and their roles in Chinese political propagation

QUAN Zongtian

(School of Arts and Law,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advanced intellectuals were the subjects of the political propagation in the period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y took propagating politics as their conscientious mission and shoulder the task in political thought introduction and enlightenment; they were the leaders of the political thinking trend and the practitioners of the political thought. The epoch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dvanced intellectual's political propagation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period were embodied as follows: the combination of introduction of advanced thought with selection; the combination of publicity and practice of advanced thought and the combination of taking social obligations with selection of political values.

Key words: in the period of the May 4th; the advanced intellectuals; political propagation; the epochal characteristics

[编辑: 颜关明]